

# 辉煌 煌雍 城

全国（凤翔）秦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先秦史学会  
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

编

凤翔秦文化研究会  
凤翔县博物馆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 辉煌雍城

全国（凤翔）秦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编 | 中国先秦史学会/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  
凤翔秦文化研究会/凤翔县博物馆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辉煌雍城：全国（凤翔）秦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中国先秦史学会等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9  
ISBN 978-7-5518-1632-8

I．①辉… II．①中… III．①文化史—中国—秦代—  
学术会议—文集 IV．①K233.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0690 号

## 辉煌雍城——全国（凤翔）秦文化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中国先秦史学会/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 编  
凤翔秦文化研究会/凤翔县博物馆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安奇良海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29  
插 页 8  
字 数 84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1632-8  
定 价 268.00 元

---

网 址 <http://www.sqcbs.cn>

《辉煌雍城——全国（凤翔）秦文化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顾 问	宋振豪	官长为	霍彦儒	田亚岐	刘宏斌
	王建民	王明明	鲁 立	冯小林	王伟波
主 任	霍铁桥				
副主任	牛军涛	董书泰			
编 委	官长为	牛军涛	董书泰	郁彩玲	王长虎
	景宏伟	曹建宁	孔令柏		
主 编	郁彩玲				
副主编	曹建宁	孙宗贤			
编 辑	王长虎	董海兵	张建儒	王重博	吴海峰
	杨 达	王晓兵	史舒强	李 亮	



# 序

由中国先秦史学会、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凤翔秦文化研究会主办的“辉煌雍城——全国（凤翔）秦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8月召开，这是秦文化研究的盛会，会议收集了64篇论文，论文内容涉及秦雍城发展史、雍城在秦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雍城都城形制、雍城的相关考古发现、与秦文化相关的研究文章[秦族源、秦国瓦当、秦之书法、秦文字、秦始皇陵、早期秦文化、秦的医学、秦制与周制、秦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关系、秦的祭祀、秦汉祭祀与文化认同、秦人与炎黄等诸多方面，此外还有简牍材料的利用（清华简、岳麓书院秦简、西周金文）、石鼓与石鼓文的讨论、秦文化的展示与利用、先秦至秦汉南海含义变迁等]。现在学术会议论文就要结集出版，郁彩玲馆长嘱我作序。

将全国性的秦文化研讨会安排在陕西凤翔召开，应该说是非常符合“学理”与“情理”的，从“学理”上讲，秦文化学术研究“离开”凤翔雍城遗址，就失去了秦文化物化载体；从“情理”上讲，是陕西及凤翔考古学、历史学的秦文化研究者，理应把秦文化研究作为“国家文化”对待，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文化是凤翔的、陕西的，更是中国的。

如前所述，秦文化研究离不开凤翔，凤翔古称雍城，雍城是秦文化的发祥地，是秦文化走向全国的“出发地”。秦人建都雍城，进入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通过秦人对国家的治理，使秦国先后进入“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之列，秦国政治家不满足于此，他们更大的政治抱负是统一六国、建立大秦帝国。这样的思想，必然产生相应的“行动”。近年来，在秦咸阳城西北部考古勘探明的多座秦王陵及其陵园布局形制显示，秦王陵与王后陵均为四墓道的“亞”字形墓室。而类似情况，在楚、齐、燕、韩、赵、魏六国王陵中是极为罕见的，它们绝大多数是“中”字形墓（目前仅仅在韩国王陵中有发现“亞”字形墓）。就此而言，秦人决定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的决心不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应该是秦国政治家从秦雍城起步的，徙都咸阳之后不过是秦国正式进入“统一中国”的新的政治行动日程。

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同一般的王朝，从雍城走出的秦国政治家，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的王国时代，使中国历史进入了帝国时代，创建了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奠定了大一统的国家政治格局。秦国与秦王朝上承两千多年的中华文明的邦国、王国时代历史，下启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时代。秦王朝基本奠定了两千年来的中国、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基因。从研究世界历史的角度而言，不了解中国历史不行；从研究中国历史的角度而言，不研究秦国、秦王朝历史更不行；研究秦国、秦王朝历史，不研究秦雍城的历史同样不行。

鉴于秦雍城的特殊历史地位，早在20世纪30年代，徐旭生、苏秉琦先生等考古学家就从北京奔赴雍城，力图通过田野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认识、解读秦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就拉开了秦雍城遗址考古工作的大幕，考古调查了雍城城墙与相关秦汉建筑遗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又先后在姚家岗考古发现了春秋时代的宫殿及凌阴遗址。这些宫殿遗址出土的东周青铜构件，使人们领略了秦国建筑的辉煌与壮观；雍城凌阴遗址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同类建筑。特别需要提出的是80年代考古勘探、发掘的春秋时代马家庄官庙遗址，这是中国考古学首次揭示出的王国时代都城之中的“左官右庙”格局，从而解读了王国时代的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并重的关系。这一考古发现为认知夏代都邑的二里头遗址官城中第一号与第二号大型建筑遗址、偃师商城官城之内西组与东组的“官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秦公陵区的全面考古调查、勘探，秦公大墓的发掘，是春秋战国时代列国都城王陵考古中开展工作最多的。城外离宫别馆遗址的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战国、秦汉时期官室建筑遗址考古的文化内涵。

新世纪之初，秦雍城豆腐村制陶作坊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取得了令学界瞩目的学术成果。更为重要的是雍城遗址考古工作者对秦雍城遗址布局形制的持续不断探索，成为雍城遗址考古工作的重点与亮点，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现在已经基本究明雍城遗址的都城布局形制与其空间的“人地关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刚刚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的考古发现至关重要，我在终评会上说，“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在“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堪称学术意义最为重大，应该位列“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榜首。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池遗址”其祭祀者是国家最高元首，祭祀对象是中国古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天”，而“祀”与“戎”是古代中国国家最为重大的两件事情。“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又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权威性的“信史”《史记》《汉书》所明确记载着的。就“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的科学性、祭祀者与祭祀对象的历史重要性而言，都是以往所有祭祀遗存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的！虽然在凤翔雍山发现的是秦汉时代“血池祭祀遗址”，但它是从春秋战国时代秦国的祭祀文化传统发展而来的。如果根据《史记·封禅书》的记载，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不断裂的中华文明”之源头，其中从凤翔雍山上溯“黄帝郊雍上帝”，就有了从“已知”求索“未知”的科学研究前提。

秦雍城的学术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与陕西凤翔的学者在秦文化研究上的开放性是分不开的，他们长期以来秉持“开门”研究的观念，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科学研究思想。特别是长期以来秦文化、秦雍城研究，立足于以社会史为基础，推进、深化秦文化、秦雍城的科学研究，这是非常值得倡导与弘扬的。



2017年4月25日

# 目 录

## 雍城论坛

- 002 | 论雍城在秦国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 杨善群
- 006 | 迁都咸阳与雍都地位 / 王学理
- 013 | 试论雍秦在秦人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兼谈雍秦文化开发的意义和设想 / 霍彦儒
- 023 | 论雍都在秦国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 杨东晨

## 雍城考古

- 030 | 秦都雍城城市体系演变的考古学观察 / 田亚岐 / 郁彩玲
- 038 | 雍山——皇家祭祀文化圣地 / 孙宗贤
- 041 | 凤翔孙家南头与城西新区周墓浅析 / 曹 阳
- 050 | 雍城秦墓中葬圭演变研究 / 刘 爽
- 057 | 从雍城到咸阳  
——凤翔秦公陵和咸阳秦陵比较分析 / 刘卫鹏
- 070 | 凤翔孙家南头村考古发现与“泛舟之役” / 刘明科
- 076 | 秦石鼓源自秦穆公西巡陇山考 / 周运中
- 085 | 石鼓作于秦文公时考辨 / 梁正齐
- 092 | 《石鼓文》的制作年代、排列顺序及其意义 / 官波舟
- 098 | 雍城秦汉文字瓦当 / 辛怡华
- 105 | 雍秦时期秦国人殉及其原因探析 / 晏 波
- 111 | 雍城遗址出土非秦文化风格青铜器初探 / 景宏伟
- 115 | 春秋晚期秦国出土玉器的艺术特色  
——以秦公一号大墓和益门二号墓为例 / 蔡庆良

.....  
简牍与文字  
.....

- 136 | 论西周金文中的秦地、秦夷和秦人  
——“嬴秦”起源于东方之确证 / 曹定云
- 142 | 不其簋史地探赜 / 杜 勇
- 150 | 鞞伯丰方鼎与《多方》文例 / 张怀通
- 154 | 秦简《为吏之道》的思想主体分析 / 李 锐
- 160 | 《岳麓书院藏秦简（肆）》补注（一） / 朱红林
- 168 | 由清华简《子仪》说秦文化之“文” / 宁镇疆
- 174 | 由《清华简》探讨嬴秦的兴起与秦襄公始国的轨迹 / 徐锦博
- 181 | 清华简《系年》“是秦先人”新解 / 李清凌
- 185 | “秦书八体”的文字学解读  
——之一：“大篆” / 朱彦民
- 193 | 秦汉简中两种身份探析 / 苏 辉
- 197 | 试析秦国思想文化的会通特征  
——以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为中心 / 陈战峰
- 203 | 秦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王 辉
- 212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六十年间秦文字的发现和研究 / 王 伟

.....  
秦文化纵论  
.....

- 229 | 秦人“从死”散议 / 张广志
- 233 | 秦三相与秦文化 / 刘宝才
- 238 | 秦人与炎黄 / 高 强
- 243 | 秦史对中国梦的启示 / 彭 曦
- 248 | 秦俗三论——以早期秦文化考古资料为基础 / 张天恩 / 张煜珏

256	弘扬大秦文化，莫忘负面因素 ——兼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清单 / 叶文宪
263	法家学说与秦帝国政治 / 张荣明
269	秦国的医学文化考察 / 赵容俊 [韩国]
276	“秦失其鹿”诸说 / 王宏波 / 宋婉琴
289	近年来关于秦人族源的考古研究 / 印群
293	“秦制”与“周制”的历史根源探微 / 徐良高
299	试论秦文化对闽越文化的影响 / 徐心希
307	秦始皇的德化与文治状况述评 / 刘俊男 / 刘伟
313	甘肃礼县境内秦文化遗名遗俗三题 / 马建营
319	秦雍文化与白狄文化的比较研究 / 何艳杰
329	秦代国家治理理念内在矛盾解析 / 李健胜
335	再论先秦时期周文化与秦文化互动关系 / 卢鹰 / 宋婉琴 / 郭中波
343	从《秦风·无衣》看秦人的爱国主义精神 / 宋婉琴
348	浅谈秦文化的概念及相关问题 / 朱君孝 / 代姝珏
352	秦汉祭祀与文化认同 ——以秦汉时期时祭为引 / 董永刚
356	秦雍城时代多元文化因素的整合 / 田延峰
362	淮水祠、雍水与嬴秦西迁 / 雍际春
365	嬴姓述略 / 张淑一
368	尚武拓疆域 仁德成霸业 ——秦穆公成就霸业的思考 / 孔令柏 / 芮扬
371	陇上秦邑考辨 ——以《水经注》为依据 / 独小川
381	秦穆公的统治思想以及对秦后世的影响 / 王长虎
384	略谈秦人在雍城时期的创新发展 / 曹建宁

387 论先秦至秦汉时期南海含义的变迁 / 刘 栋 / 韦 勇 / 黄学彬

.....  
雍秦文化保护与开发  
.....

393 提升关、天经济区“秦文化旅游圈”的思考 / 徐日辉

397 关于雍秦文化展示的思考 / 郝良真 / 李建欣

400 大遗址保护利用中人、事、物的协调与和谐 / 任建库

407 大遗址价值评价体系研究

——以秦雍城遗址为例 / 刘卫红

416 关于雍秦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思考 / 朱玉林

.....  
雍秦陵秦俑动态  
.....

421 秦马车的文化史意义

——从秦陵出土铜车马谈起 / 史党社

432 天下、中心与皇权：

秦始皇陵的形式与秩序构建 / 张卫星

445 何以“中成观游，上成山林”

——试读秦始皇陵园布局体系 / 王 焯

453 后记

壹

雍城论坛

论雍城在秦国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杨喜群

迁都咸阳与雍都地位 王学理

试论雍秦在秦人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兼谈雍秦文化开发的意义和设想 霍彦儒

论雍都在秦国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杨东晨

# 论雍城在秦国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杨善群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说起秦国历史上所建的都城，人们往往列出一大堆名称。如王国维《秦都邑考》云：“有周一代，秦之都邑分三处，与宗周、春秋、战国三期相当。曰西垂，曰犬邱，曰秦，其地皆在陇坻以西，此宗周之世，秦之本国也；曰汧、渭之会，曰平阳，曰雍，皆在汉右扶风境，此周室东迁，秦得岐西地后之都邑也；曰泾阳，曰栎阳，曰咸阳，皆在泾渭下游，此战国以后秦东略时之都邑也。”<sup>[1]</sup>近年也有学者阐述：“春秋初年，自第一代国君襄公被封诸侯之后的近六百年间，秦国历经了西犬丘（西陲）、秦邑、汧、汧渭之会、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和咸阳等多处都、城、邑，史称‘九都八迁’。”<sup>[2]</sup>像这样不分主次轻重，罗列一长串名字，似乎给人一种错觉，秦国是在不停地迁都之中，历史上的众多都城，都不过是暂居之地。这是不正确的。实际上，位于今陕西凤翔县的古都雍城，在秦国发展史上非同一般，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兹对这个问题，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

## 一、秦国在雍城建都历时最长

雍城建都的时间究竟有多少年？我赞成这样的说法：“自秦德公元年（前677年）初居雍大郑宫起，止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自雍徙都咸阳’，秦置都雍城达327年之久。”<sup>[3]</sup>《史记·秦本纪》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德公“初居雍城”，并在那里建筑了“大郑宫”，当然已经定都于此。那么秦国自建都雍城之后，何时再迁新都呢？《秦本纪》又述：“（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史记·商君列传》进一步申论：“（孝公十二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由此可见，秦国确实是在孝公十二年，大建冀阙宫庭，把国都从雍城迁到了咸阳。如此计算，秦国在雍城建都的时间，从德公元年（前677）到孝公十二年（前350），确实有327年。秦建国于襄公八年（前770），《秦本纪》称此年“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襄公于是始国”，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吞并六国建立秦朝，秦国的历史约为550年。在这550年中，秦国有327年，即一半以上的时间建都于雍。可以说，秦国的大部分岁月是在雍城经营发展起来的。

这里，必须对以下问题作一些辨析。

一是《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各国君历年及居、葬处云：灵公“居泾阳”。据此许多学者认为，灵公时秦都已迁至雍城以东泾水入渭处的泾阳。这是不符史实的。林剑鸣《秦史稿》申辩说：“此时灵公由雍至泾阳是可能的”，“但作为国都，此时仍在雍城，并未迁于泾阳”。《秦始皇本纪》附《秦纪》同时说：灵公“葬悼公西”，而悼公葬雍，则灵公亦葬雍。又，泾阳遗址至今未有任何发现，“这也可作为秦未尝在此定都的证据

之一”<sup>[4]</sup>。因此，王国维考辨：“灵公虽居泾阳，未尝定都也。”<sup>[5]</sup>这个判断，应该是可信的。

二是《史记·秦本纪》载：秦献公“二年，城栎阳”。《集解》引徐广曰：“徙都之。”据此有更多的学者认为，秦献公二年（前383）已经把国都由雍迁至栎阳。这亦是肤浅之见。虽然，《秦本纪》记孝公元年下令国中曰：“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繆公之故地。”但由此正可以看出，献公的“徙治栎阳”，是为了“镇抚边境”，因“欲东伐，复繆公之故地”而采取的暂时性措施。秦孝公元年“下令国中”说这些话，表明他当时还在雍城，对献公的“徙治栎阳”进行评论。献公“徙治栎阳”，纯粹是为了军事的目的，可能只迁去了一些军事设施，其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部门，应该仍留在雍城。况且，栎阳在今西安市东北的临潼区栎阳镇，不仅离雍城较远，还在咸阳的东面。孝公十二年的“徙都”咸阳，不可能是自东向西徙，而只能是为了向东发展而自西往东徙。因此，《史记·商君列传》云：孝公十二年“秦自雍徙都”咸阳，是正确的。林剑鸣《秦史稿》认定《商君列传》载“秦自雍徙都之”咸阳为“误”，称“早在秦献公时，秦都已从雍徙往栎阳”，“应当是由栎阳徙都咸阳”<sup>[6]</sup>。林先生没有考虑到献公“徙治栎阳”的具体情况，孝公对献公“徙治栎阳”的评论以及雍、咸阳、栎阳的地理位置，而以司马迁之言为“误”，这应该是智者千虑中的一失，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由以上辨析可知，秦国在雍城建都，前后延续确实有327年。在秦国历史上，以雍城为国都的君主有二十位，即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哀公、惠公、悼公、厉共公、躁公、怀公、灵公（曾居泾阳而未定都）、简公、惠公、出子、献公（曾徙栎阳作暂时性搬迁）、孝公（前期在雍）。建都的历史如此之长，定都在这里的国君如此之多，雍城在秦国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可想而知。

## 二、雍城是春秋前期至战国中期秦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中心的雍城，从其宫殿建筑的宏伟、国君陵园的分布和中小型墓葬的数量之多，可以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其地位。据《史记·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后附录所记，雍城内建有大郑宫、阳宫、高寝、太寝、左宫、受寝等宫寝。雍城考古队经过辛勤探测，在雍城遗址的马家庄、姚家岗、铁丰——凤尾村三个地点，发现了大型密集的宫殿建筑遗址<sup>[7]</sup>，证明《史记》所载雍城内建有国君所居的许多宫寝确实存在。雍城考古队又在雍城遗址以南的南指挥村附近，发现了秦公陵区。该陵区东西长七千米，南北宽三千米，区内有十三座秦公陵墓<sup>[8]</sup>，证明《史记·秦始皇本纪》附录所载许多秦公葬于雍，也是确凿的事实。雍城遗址近郊还发现许多中小型墓葬群，分布在雍城的西、南两面，面积达十五平方千米。两片墓地已探明的墓葬数以千计<sup>[9]</sup>。同时，考古调查还发现，每一处宫区范围的建筑都有多个层次：一类是较大型的建筑物，运用高档的建筑材料；另一类是中小型建筑，还有较为密集的聚落型建筑。这些建筑形成一个组合体系<sup>[10]</sup>。从上述考古成果推断：大型宫殿建筑为秦公及其家属所居，是秦国君权的中心；中型建筑或为国家官署和贵族所居，小型密集建筑应为下层的“国人”所居，这些是秦君统治的基础。近郊的许多中小型墓葬群，应该是族葬制度的反映。看来，秦国的统治者在这里秩序井然，政令通达，直至边境的所有国土。

考古工作者在雍城遗址及近郊，曾发现过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青铜生产工具和兵器，有斧、铤、凿、刀、戈、镞、削、钻、镰、锯等<sup>[11]</sup>。这表明，雍城不但是一个行使政权的城市，而且是一个进行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城市。这些青铜生产工具，可以看出秦国生产力的发展和青铜冶铸技术的高水平。特别是秦公一号大墓，虽经历年的盗掘，仍出土有各类文物三千余件。其中有十多件铁铲等铁质工具，是目前北方地区发现的年代较早的铁器，说明秦是率先使用铁工具的春秋诸国之一<sup>[12]</sup>。考古调查还在雍城遗址发现了各种手工业作坊多处，如在史家河、马家庄一带发现青铜作坊遗迹，在史家河、东社、高庄一带发现炼铁作坊，在豆腐村、

铁丰、瓦窑头等地发现制陶作坊<sup>[13]</sup>等。在城址各聚落之间，有广阔的空隙地带，这应该是农田区域。当时雍城周围有多条河流通过，可提供丰富的水资源，为农田作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sup>[14]</sup>。农业、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壮大了秦的国家实力。丰富的考古资料表明，雍城又是秦国当时的经济中心。

据研究，陕西凤翔马家庄发掘的春秋秦一号建筑群，其总体部署与史籍所载诸侯宗庙布局大体相同。这些单体建筑，分别具有宗庙中的祭祀、燕射、接神等功能<sup>[15]</sup>。在秦都雍城，经常进行各种礼仪活动，如觐见礼仪与朝贺之礼等。国君与大臣、秦国与东方各国的使节，其礼仪活动相当频繁。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前，政治、文化中保留旧的传统较多。商鞅把所有官署迁到了新都，宗庙、祭祀上帝以及鬼神的神祠仍然留在旧都雍。商鞅变法以后，政治上许多大典移到咸阳举行，但是君主宗族中的礼仪以及祭祀天神的典礼，仍然要到旧都雍去举行<sup>[16]</sup>。《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政九年）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带剑。”可见，此年秦王政要举行“冠礼”，乃回到旧都雍，住在“蕝年宫”，完成了这项传统礼仪活动。当年秦都雍的宫室建筑瑰丽奇异，富有艺术色彩。《史记·秦本纪》载穆公时戎人由余来到秦都雍，见了雍城颇具匠心的宫室建筑后说：“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其宫室建筑的精致新颖，可以想见。此外，秦公一号大墓还出土过各种金、玉、木、漆制品。这些制品，都设计奇特，工艺精美，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sup>[17]</sup>。由上所述，秦都雍城经常举行周朝诸侯的各种礼节仪式，其传统礼仪和祭祀上帝鬼神的活动相当活跃。雍城的宫廷建筑和工艺制品，都设计新颖，精美绝伦。无疑，秦都雍城又是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

还有一件文物值得注意，那就是唐代发现的石鼓文。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当时石鼓文在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县）郊外的野地中。经学者们考定，此石鼓为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遗物，其年代有襄公、文公、穆公、献公、惠文王诸说<sup>[18]</sup>。从唐代发现此文物的地址正位于秦都雍城郊外来，此文物很可能是秦都某贵族士大夫所作。这为雍城是当时秦国的文化中心，又添一新证。

### 三、立足雍城，秦国在东西两个战场取得重大胜利

德公迁都于雍，是一步有深谋远虑的决策。因为过去秦的建都之处都在河谷地区，回旋余地小，不便发展；而雍城在雍水附近，地势较高，物产丰富，无论攻守都十分有利<sup>[19]</sup>。《史记·秦本纪》记德公“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正义》曰：“卜居雍之后，国益广大，后代子孙得东饮马于龙门之河。”可见其定都于雍后的雄心壮志。

雍城初期依靠四周的雍水河、纸坊河等河流作为主要城防设施，同时又构筑了一些城墙并开挖人工城壕作为辅助手段<sup>[20]</sup>。《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载：悼公“城雍”。可见其城墙在建都三百多年间不断进行修筑、加固。

秦国凭借雍城优越的地理条件、丰富的物产资源、坚固的防御设施，以此为基地不断向外攻伐取胜。《史记·秦本纪》载宣公四年（前672），“与晋战河阳，胜之”。穆公元年（前659），“自将伐茅津，胜之”。穆公五年（前655），“自将伐晋，战于河曲”。这几次战争，都是秦向东发展、伐晋取得的胜利。河阳、茅津、河曲，当都在今山西西南隅黄河边。至穆公十二年（前648），“晋旱，来请粟”。次年，秦“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秦国慷慨与粟赈灾，从雍都“船漕车转”，相望至晋都绛，显示了秦国的实力，赢得了晋国的民心。《左传·僖公十三年》称此为“泛舟之役”，可见秦水上交通的发达。穆公十四年（前646），“秦饥，请粟于晋”，晋弗与而兴兵攻秦。次年，秦、晋战于韩（今山西河津、万荣县间）。《太平御览》卷八七七引《史记》：“（晋惠公）至六年，秦穆公涉河伐晋。”穆公得到岐下野人的帮助，“虏晋君以归”。《史记·秦本纪》载：此时晋惠公“夷吾献其河西地”，“是时秦地东至河”。《正义》曰：“晋河西八城入

秦，秦东境至河，即龙门河也。”秦穆公从雍城出发，涉河伐晋，取得大胜。秦国终于东向“饮马于河”，实现了德公的梦想。穆公三十六年（前624），为报复晋人在崤（今河南洛宁县西北）袭击秦师之役，派兵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左传·文公三年》）。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王官“当在今山西省闻喜县西”<sup>[21]</sup>。可见此次战争已深入到晋国的中心地区，是秦伐晋的又一重大胜利。

穆公在向东伐晋、开拓疆土的同时，又向西攻伐戎人。当时戎王派遣曾是晋人的由余至秦探访。穆公一方面对由余以礼相待，询问戎情；另一方面“以女乐二入遗戎王”，使其意志消沉。穆公三十七年（前623），“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林剑鸣《秦史稿》称：“由于秦穆公灭西戎，秦国直接统治的地域，其西方至少达到今甘肃中部以至更远的地方。”<sup>[22]</sup>穆公三十九年（前621），穆公去世后“葬雍”（《史记·秦本纪》），说明他在东西两个战场有如此辉煌的成就，都是由立足于雍，凭借雍城优越的地理位置、充足的物资供应和良好的人文环境而取得的。

其后，秦国诸君还不断以雍城为立足点，向东、西、南、北四方面攻伐，取得不少胜利。据《史记·秦本纪》载，康公二年（前619）“秦伐晋，取武城”。“六年（前615），秦伐晋，取羈马，战于河曲，大败晋军。”厉共公二年（前475），“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三十三年（前444），伐义渠，虜其王”。惠公“十三年（前387），伐蜀，取南郑”。孝公元年（前361），“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獮王”。上述战争，除伐晋、伐大荔（今陕西大荔县）、围陕城（今河南陕县）属于东向之外，伐义渠（今甘肃庆阳市）属于北向，“斩戎之獮王”（在今甘肃陇西县）属于西向，“伐蜀，取南郑”（今陕西汉中市）属于南向。特别是孝公元年，在雍城即位，便下令国中，立志振兴秦国。为表示自己的决心，乃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王，在东、西两方面左右开弓。秦国历史上二十公在雍城的雄风，于此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在雍城建都的时间很长，达二十公，计327年。当时的雍城，宫廷建筑雄伟，国君陵墓众多，还有许多中小型建筑和墓葬群，这里分明是秦国的政治中心。雍城又有许多手工业作坊、农田作业区，出土过相当数量的青铜生产工具和铁制工具，表明这里又是当时秦国的经济中心。雍城的某些建筑设计，与周朝诸侯的宗庙大体相同，这里传统的祭祀和礼仪活动相当频繁；各种工艺制品，设计新颖，富有艺术气息；特别是宫廷建筑，精致奇特，叹为观止；还有唐代发现的艺术性很强的石鼓文，也在此地郊外，显然，雍城又是当时秦国的文化中心。特别是雍城的地理条件优越，物资丰富，能攻善守，当时的不少国君都以此为基地，向东西南北的各个目标发起攻伐，不断取胜，从而使秦国日益壮大，成为雄踞于西方的强国。

雍城在秦国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这是显而易见的。地处秦旧都雍城的今陕西凤翔县，应该继承雍城在秦国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励精图治，振兴经济，发展文化，再现古都雍城的雄风，成为陕西省乃至全国的重要都会。

## 注 释

- [1][5]王国维：《秦都邑考》，《观堂集林》卷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第532、533页。  
[2][10][13][14][20]田亚岐：《秦都雍城布局研究》，《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5期。  
[3]田亚岐：《秦都雍城考古录》，《大众考古》2015年第4期。  
[4][6][18][19][22]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1、205、103~107、43、50页。  
[7][8][9][12][17]朱凤瀚：《秦都雍城考古述要》，《历史教学》1986年第11期。  
[11]赵丛苍：《陕西凤翔发现春秋战国的青铜器窖藏》，《考古》1986年第4期。  
[15]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2期；韩伟：《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刊处同上。  
[16]杨宽：《秦〈诅楚文〉所表演的“诅”的巫术》，《文学遗产》1995年第5期。  
[2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529页。

# 迁都咸阳与雍都地位

王学理

(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

## 一、“迁都咸阳”解义

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商鞅进行第二次变法时有一项重大的举措,这就是把国都确定到了咸阳。

迁都咸阳的时间,《史记·秦本纪》载:“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世系孝公条是“其十三年,始都咸阳”。这两条引文的时间不同,也未注明载徙自何处。而只有《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这很明确地说都城迁自雍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

“居三年”,是从商鞅将兵围降魏都安邑时算起的。而迁都有“十二年”与“十三年”之别,我们可以看作前者是建设新都从“筑冀阙”开始动工的时间,后者是秦国中央政权中枢正式到咸阳办公的时间。两者表述并无不妥。

大家知道,《史记·秦本纪》有这么一条记载:献公“二年,城栎阳”。《集解》引徐广的说法是“徙都之”,这也是很多学者认为秦献公自雍迁都到栎阳的根据之一。事实上,秦孝公不但出生在栎阳,而且也是在栎阳继位的。况且他直接说“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那么,栎阳既是秦献公之都,而且时间又不远,为什么《商君列传》要说成是“自雍徙都之”呢?

原来秦献公为收复河西地而把指挥中心由泾阳搬到临近洛水的前线后部——栎阳,并作了初步改革。因此,无论泾阳或栎阳,都属于临时的性质。秦泾阳约在今口镇街西南、冶峪河东岸的二级台地上,那里有“谷口宫遗址”<sup>[1]</sup>,但还不能确认它就是秦灵公所建的泾阳城;而栎阳故城,经过几个考古部门多年的勘探,已有可喜的发现。但这两处在史书记载的背景和地理形势上都是逐步接近魏国、以夺回河西地为目的,带有军事据点的性质,并非居都的久留之地。如果按君主居留为都的含义而论,泾阳、栎阳算作秦都也是对的,像春秋战国时期关东国家多次迁都的例子有很多。但雍都的情况与前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那里是秦人立国后发展壮大的根据地,既是先王宫殿和陵寝的所在的也是祀天的中心,保留有宗庙重器,所以说把徙都咸阳说成“自雍”,是有道理的。同样,晚此一百多年(前238)时间的嬴政的加冠典礼仍要到雍城去举行,就足以说明雍都悠久的历史和政治地位的重要。

秦孝公定都咸阳是以“筑冀阙”为起始,又以此作为立都的标识,可见这一建筑非同凡响。应该说它与后来